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丛书

所谓市井文化，

它是伴随人类交

封建社会中的市

也有其萌芽、兴旺、

但他们始终与封建社会

因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貌，

充满了旺盛的活力……

而市民，

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

也自有其共同的心态，

尽管这诸多心态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让我们展开这历史的画卷，

饱览市民心态的缤纷世界吧……

赵伯陶 著



换活动的频繁而生成并逐渐丰富的。

井文化与城市市民，

变异传承的成长历程，

中的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市井文化 与市民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丛书

市井文化 与市民心态

赵伯陶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赵伯陶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ISBN 7-5351-1921-2

I. 市… II. 赵… III. 市民—文化—专题研究—中国—封建
社会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0830号

出 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441021·襄樊胜丰路45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9.75印张

版 次: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41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1921-2/G·1564

定价:14.5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引 论	(1)
-----------	-----

上卷 充满活力的成长历程

第一章 走向成熟的足迹	(19)
--------------------------	-------------

(一) 从市井和城市谈起	(20)
(二) 义利之辨的最初展现	(30)
(三) 市道——商人意识的渗透	(34)
(四) 侠与义的合流	(40)
(五) 财利与权力的分合	(45)
(六) 抑商——封建主义的杀手锏	(50)

第二章 开启市民的大门	(56)
--------------------------	-------------

(一) 从坊市制的崩溃谈起	(57)
(二) 瓦子——市井文化的生态空间	(64)
(三) 市民——形成阶层的群体	(69)
(四) 丰富多采的京瓦伎艺	(76)
(五) 说话——诱人的讲唱文学	(83)
(六) 戏曲——不限于城市的艺术	(91)
(七) 词曲——市井与士林的两栖艺术	(99)
(八) 空前繁荣的物质文化	(109)

第三章 迎接近代的曙光	(118)
--------------------------	--------------

(一) 从市镇的勃兴谈起	(119)
(二) 哲学——时代的呐喊	(127)
(三) 风起云涌的市民运动	(135)

(四) 文艺启蒙——市民意识的折光·····	(142)
(五) 拓展的小说世界·····	(151)
(六) 更新的戏曲天地·····	(167)
(七) 与宗教关联的宝卷及其他·····	(178)
下卷 透过棱镜的缤纷世界	
第一章 拜金狂潮下的喜怒哀乐·····	(191)
(一) 金钱魅力下的世态·····	(191)
(二) 如履薄冰的忧患·····	(198)
(三) 扭曲的生活追求·····	(205)
(四) “义”的深层剖析·····	(212)
第二章 情欲杠杆下的悲欢离合·····	(220)
(一) 婚姻自主的憧憬与追求·····	(220)
(二) 妇女地位的深层审视·····	(228)
(三) 纵欲与真情的分流·····	(235)
(四) 人类情欲的不谐和音·····	(242)
第三章 生灵叹息下的困惑迷惘·····	(249)
(一) 劝善与自律·····	(249)
(二) 旖旎的神仙之梦·····	(256)
(三) 方术灵光下的痴迷·····	(263)
(四) 泛神世界的奇光异彩·····	(270)
第四章 专制枷锁下的企盼追求·····	(278)
(一) 突破传统的价值取向·····	(278)
(二) 科举——并非仅是读书人的龙门·····	(286)
(三) 侠客——并非都是成年人的童话·····	(292)
(四) 清官——一个颇为久远的青天梦·····	(299)
结 语·····	(306)
后 记·····	(307)

引 论

(一)

广义地讨论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都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其概念的模糊性更使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有了无所不包的特性。然而若认真研究起来,文化却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论者扑朔迷离。

在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泛指文治与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 15《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一番话无非是讲先礼后兵,“文化”即“以文化之”。显然,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今天所常用的“文化”一词的概念,是由西方传进的,其译词则以日语为媒介。在英文、法文中,文化作 Culture,德文作 Kultur,它们都是从拉丁文 Cultura 变化而来。在拉丁文中,Cultura 具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以及敬神等多重义项,内涵极广,难以一言蔽之。在中国的《辞海》及其他有关辞书中,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一段话分成前后两部分,被视为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如此大而化之,固然无懈可击,却仍有“江山一笼统”的缺憾,仿佛是《庄子》寓言中的“五石之瓠”,因“拙于用大”,终难以为器。

成书于 1952 年的克娄伯与克鲁克洪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曾将 1871 年至 1951 年共 80 年间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统计,竟达 164 种之多。而随着世界科技与人文的迅速发展,关于文化的定义也日新月异,有增无减。论者对文化的

理解随角度相异而各有千秋,并都费尽心机地作出了自认为严密合理的解释,却又都难成公论。之所以如此,除了文化的内涵丰富外,其外延的难以界定也是诸多论者遇到的难题。当总体把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分类研究的具体性时,也许暂时避开对文化定义的讨论是最佳选择。

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社会物质生产程度相适应的文化。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历史的纵深角度考察,文化可以粗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它体现了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发展。现代文化是以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除了体现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外,也使各自保留自己的民族色彩或地域特征的文化有了相互比较的可能。

若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标准,文化的历时性的划分又可以有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等等的不同。然而如此划分有时稍嫌笼统,于是有一些论者更习惯于按历史朝代划分文化的发展阶段。如中国的封建文化,就可以分成先秦、秦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阶段,当然还可以再细一些,然后于每个阶段再分门别类地叙述讨论文化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中,还有属于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黑陶文化、彩陶文化等史前文化,除了反映其发生地域或特征的不同外,也自有其历时演进的轨迹。这些文化纵横交错,即使这方面的考家也难以一时说清楚。

文化的历时研究既然如此繁复,其共时研究也包罗万象,按不同的标准又可以划分为多种组合。若着眼于精神文化方面,可以有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各种制度文化的区分,多属于上层建筑。若专注于物质文化方面,又可以有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舟车文化、医药文化、居室文化等等,不一而足。无论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一般都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论述中国文化史,有些论者按某种逻辑将文化分为学术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科技文化、生活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语言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至此意犹未尽,又加“中外文化交流”一编与之并列。有的论者撰写中国文化史,将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春秋战国文化、秦汉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五代宋辽夏金元文化、明清文化各列专章分述,各章之下又分论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宗教、学术、医学等等。若纯从逻辑角度考虑,上述两类划分方法似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文化的蕴涵丰富,致使研究者难以用一种统一的标准去归划类属;而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存在的相互影响,也难以令划分标准完全符合某种逻辑。特别是在其中一些部类早有专史研究的情况下,如文学、宗教、医学等等,若将它们划出文化史范畴,实难割爱,若在文化史中提及,又只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能深入探讨。如此两难处境是诸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大题目难以写精致的原因。这种文化史只能给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大致的轮廓,概括言之,不求深入是这一类著作的特点,显然这对于一般读者了解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是必要的。

从历史上考察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文化,纯粹历时的研究,自可由各文化部类的专史承担,这样也易见其纵剖面的齐整。纯粹共时的研究,由于各部类的联系脉络不易理清,横断面的复杂往往使视野模糊。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研究问题的一个适宜的切入角度呢?一个社会中,同时并存雅与俗两种文化,或曰同时并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文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

(二)

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分化以后,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文化,都可以大致分为雅俗两种。当然,这只是就其牵牵大端而言,雅俗

两种文化既对立又有联系,相互渗透影响,绝非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在封建社会中,将雅文化与统治者联系起来,将俗文化与被统治的广大民众联系起来,并无大错。但这一分化并不总是壁垒森严的,特别是国家动荡、天崩地解、社会动乱之际,尤为如此。文字记载下来的文化雅的居多,俗的文化一经文字筛选,也有雅化了的倾向,不能完全以“俗”目之了。

袁行霈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曾将中国文学分成四大类别,即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与乡村文学。据著者自言:“这种分类,既着眼于题材内容,又兼顾文学产生发育的环境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赏者,是一种综合的分类法,”无疑,如果将这种文学的综合分类法借用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也有其长处,尽管这一分类并不能涵盖文化的所有部类。如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等等,就难以在这种四分法中找到适宜的或固定的位置,然而无论如何,它在文化研究的一定范畴中仍可以显示出较为方便的特点。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皇家气象自不同于寻常百姓家,与官宦人家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宫廷文化是独特的,不仅在一个朝代中有传承性,在不同的历史朝代之间也有因袭的因素。

封建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是属于统治者阵营的,他们既要驭下,又要奉上,即使是“无官一身轻”的文人墨客,其追求也与庶民百姓有明显不同,更多关心的是温饱以外的物质与精神的享乐。研究士林文化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方兴未艾的中国文人画研究即是一例。

乡村文化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有其特殊的意义,从《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优美民歌到近现代的一些动人的民间传说以及某些习俗等,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足迹。在民间文学这枝芬芳的花枝上,就有许许多多乡村文化的清露。

市井文化是伴随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萌生和发展而不断成长

丰富的。伴随唐代以后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一代表着新兴力量的文化就不断向旧制度和旧秩序进行着挑战。总的说来,市井文化作为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一股异己势力,一直不断冲击、侵蚀着封建专制统治基础,它是一种蓬勃发展却又夹杂着一些污泥浊水的文化。

上述四种文化,宫廷文化与士林文化属于雅文化的范畴,乡村文化与市井文化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俗文化与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化并不完全等同,这就像俗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文学一样。市井文化部分包蕴于民间文化中,且是联系民间文化与士林文化的桥梁。如市井文化中的话本小说本是以娱乐市民为主的讲唱文学形式,当它为封建文人所模仿,并有大量的拟话本小说问世以后,这一文学形式就注入了士林文化因素。同时这一模仿又反作用市井文化,使正统儒家思想不知不觉地进入市井之中。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记述有这样的影响: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纪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

鲁迅对此更有精辟的议论:“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华盖集·马上支日记》)同时,市井文化中的物质内容也时刻对雅文化产生影响,翻开《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笔记稗史,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影响的深刻。

市井文化对宫廷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

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刘邦为了博得老父亲的欢心，竟把江苏的新丰“搬”到了都城长安附近，为市井文化进入宫廷大开了方便之门。另据《宋史·蔡攸传》：

攸历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进见无时，益用事，与王黼得预官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袴，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每道市井淫媒浪语，以蛊帝心。

奸佞为迷惑人主，有意识地向宫廷引进市井文化中淫邪的内容，作为帝王的享乐，使雅文化中未能免“俗”地染上了市井气。至于像晋愍怀太子、刘宋少帝、齐东昏侯等人将市井交易买卖引入宫廷，甚至亲自酤卖，就更是市井文化走进宫廷的渠道了。

自然，宫廷文化对于市井文化也有巨大的影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告诉了我们这一影响的广度。“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乐府诗集·城中谣》）的唱叹，就将市井文化联系宫廷与民间的作用数语道破了。

词、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载体，并非纯粹产生于市井之中，但它们却是通过市井文化的媒介，才堂而皇之地跨进雅文化的艺术圣殿的。士大夫与宫廷皇室作为享受，或聆听、或观赏这些艺术，只体现了这种媒介作用明显的一面；其隐蔽的一面，则是这些文学艺术样式逐渐为文人士大夫所掌握，纳入于雅文化中，从而成为雅文化中的门类。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市井文化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市井文化属于俗文化，却又是雅俗两种文化交互、影响的中介，没有这一中介，雅俗间森严的壁垒就难以突破，也就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了。此外，市井文化的物质环境也是促进雅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徐凝《忆扬州》），正是像扬州这样繁荣的都市商业，为士林文化与宫廷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清代的“扬州八怪”出现于扬州，绝

非偶然的现象。

(三)

按照一般通常的理解,伴随城市的产生就应该出现市民。《晏子春秋》中所云:“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其主语自然就是临淄城中的居民,说他们是市民,似乎不能算错。然而市民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城市建置的改观等等,市民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使市民的内涵有了古今的不同。同时,地域的差异、国家的不同,又使市民这一概念存在着中外的区别。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 1985 年出版)一书曾这样记述欧洲的市民:

商人聚居地称为新堡,以别于原来的旧堡。从而新堡的居民最迟从十一世纪初期起得到市民(burgess)这个名称。据我所知,这个词于 1007 年第一次出现在法兰西,1056 年出现在佛兰德尔的圣奥梅尔;以后经莫泽尔河地区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新堡即商人城堡的居民,得到了或者更可能是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市民这个名称。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据《中世纪的城市》一书记述,“每个在城墙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农奴,就确定无疑地享有了自由。时效取消了他的领主对他本人和他的财产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这种反抗封建领主的性质,使居住其内的广大市民注定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为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市民”作为资产阶级的前身,更染有近代的色彩:“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宣

言》)无产者也属于市民社会的成员,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显然,欧洲的市民社会在历史上早已孕育出一个具有近代政治要求的市民阶级,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曾出现过一个举足轻重的市民阶级呢?

若讨论这一问题,就难以避免地要涉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文革”十年时期除外),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何时萌芽这一问题,一直有所论争,最早有主张萌芽于战国时代者,其下还有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而以明代说为众多论者所认同。研究中国的市井文化与市民问题,自可以避开这些争论,但从市井文化的发展变化轨迹来考察,它与市民内涵的变化发展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市民与欧洲市民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不同之处,它是否已发展成为具有资产阶级前身的资格,本书无意于作过细的讨论。值得瞩目的是,市民作为一个阶层大约形成于何时,巩固于何时,发展变化于何时。从问题的这一角度来看,市井文化当先于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存在,而随着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随着俗文化与雅文化的交融汇合,市井文化也不断丰富着自己,从而显示出一条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轨迹。我们没有理由忽略在市井文化背后隐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杠杆,商品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对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破坏作用,使市井文化也具有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特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市井文化在促使中华民族文化走向近代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市民只有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的时候,才具有其心态研究的价值。唐代坊廓户的出现为市民阶层的形成作了准备,而宋代坊廓户范围的扩大与分等,标志着这一阶层的最终形成与壮大。城市建置中坊市制的崩溃于宋代,更为市民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与自由的发展空间。包括话本小说在内的讲唱文学的兴盛以及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无不与宋代市井文化的生态环境相关。宋代是市井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元代统治者凭着“塞北雕弓硬”,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一个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生产力较先进的民族,其代价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的短暂停滞甚至倒退。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代表市井文化较高成就的元杂剧和散曲,但由于其社会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即主要服务于蒙古、色目人贵族的特质——使市井文化的总体发展处于停顿状态,在地域上也陷于缩小到几个大城市的处境。

朱元璋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明朝以后,逐步恢复了被元统治者破坏了的社会生产力,全国各地的市镇在宋代江南村市、草市的基础之上勃兴,很多已具备了工商业市镇的规模。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数千户乃至上万户的繁华市镇几乎遍布江南。发达的市镇经济为市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也为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江南市镇人文荟萃,科举兴旺,生活奢华,户口日繁。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市镇正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市民在数量上的急速增长,在壮大市民阶层的同时,在“质”上也发生了与宋代市民阶层明显不同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已有了迎接近代曙光的勇气。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风尚急剧向纵欲享乐的方向发展。从历史的观点考察这些变化,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因素,在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纵情声色的背后,不也隐藏着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的积极因素吗?这很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谈》中所描述的那些场景,尽管有淫秽丑陋之处,但他却把人类的污浊暴露给人看,从而显示了作为新兴力量市民阶级的抗争和追求。在政治上,明代东林党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而斗争本身也是联系士大夫与市民阶层的纽带。

明天启六年(1626)爆发的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的斗争,就是这一纽带巨大力量的体现。在哲学上,以王守仁弟子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鼓吹“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民的要求,可以被视为市民走向近代的哲学先声。李贽宣扬“童心说”,大声疾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这些所谓“异端”思想,也是市民思想的折光。

标举自然人性,反抗封建礼教,也是明中叶以后文学发展的主流。汤显祖《牡丹亭》的问世,“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的大量涌现,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的提出,无不显示出市民意识的觉醒,打上市民心态的印迹。明末发生的反对矿税使的风起云涌的市民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挺身而出的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视死如归,标志着这一阶层逐渐走向成熟。而这些斗争有许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更是市民阶层从自为走向自觉的证明。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仍是以武力征服了已具先进生产力的民族。明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又一次受到暂时的扼抑,而政治的高压、民族的歧视,也中断了市民队伍的发展及其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径。虽然在此后不久的“康乾盛世”,市井文化又有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阻绝了市民阶层大量演化为资产者并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道路。论述中国封建社会中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的任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一段落了。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更使市井文化面目一新;那么,明代中后期启蒙思潮的蔓延,就使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为迎接近代作好了准备。把握住历史上的这三个时期,也就把握了市井文化发展的关键。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长历程。

(四)

如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由于史籍文献给我们留下的有关记载太少并且过于分散，这迫使我们只能从话本、词曲、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有关学者的哲学思想和一些史乘典籍、笔记稗史中去勾沉辑佚，寻觅有关此一课题的蛛丝马迹般的材料了。研究现代市民心态，研究者可以借助有关调查表格或采访有关人物获得第一手材料，从而为定量、定性的科学分析研究打好基础。对旧时代的市民进行心态研究，完全没有使用上述方法的可能，而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材料进行研究。混合光通过棱镜以后会折射出七种色光，它告诉了我们光的本质，因而它是真实的。

保存于今的宋人小说话本，数量虽不多，并且已经过明代文人的加工增饰，与说话伎艺的原始面貌已有了某种差异，但仍可折射出宋代市民的种种心态。这一类话本是为直接娱乐市民而产生的，因而所反映的生活肯定与当时市民最贴近，也最具研究价值。同理，宋元南戏与元杂剧等直接为广大市民服务的戏曲艺术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至于像《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游览志余》等诸多笔记，为我们记录了当时汴京或杭州的有关习俗和风尚，不失为作第一手材料的使用价值。宋代如此，记述元、明、清朝代的有关市井或城市内容的笔记、方志等，也有同样的功效。我们只有熟谙了市井文化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时代氛围，才有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

《宋稗类钞》卷一“吏治”记述北宋“铁面御史”赵抃（1008—1084）一事，《宋史》不载，却很有认识价值：

赵清献公闻道抃，治民所在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熙

宁中，以大资政知越州，西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六七。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闻道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巢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巧妙运用价值规律，重视商贾作用，除表明赵抃的贤明外，也从侧面反映了市民意识。《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有一段类似的论述，发人深省：

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厰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显然，没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是难以认清这一“容易明白”的道理的。而市井文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密切，正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市井文化的发展。可见，无论笔记野乘，还是小说话本，对于研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都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也是为当时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前者讲史，多有虚构，不直接反映市民生活，然而书中所始终贯穿的“义”的说教，对于才能和机智的肯定等等，无一不与市民中的小生产者、经商者的追求与期望合拍。后者有部分内容接近市民生活，“落草为寇”、背叛朝廷，也许并非是多数市民的心态；然而书中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猛仗义、生死以之的友朋之情、痛恨贪官污吏的激愤心理，也无一不与市民日常所思发生强烈的共鸣。在反映市民心态方面，两部长篇小说的资料价值也不言而喻。

神魔小说《西游记》虽不直接反映尘世生活，而其间洋溢的市民情趣却很耐人寻味，特别是小说中猪八戒的生动形象，它好色贪小便宜，偷懒又好表功的性格，就颇有市民色彩。但总的来说，这部小说反映市民心态远不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那样直接明显。